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4.015

“一带一路”倡议下正式制度距离与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

罗喜英,张睿敏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以2013年至2018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正式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经济制度距离与CSR负相关,且正向经济制度距离与CSR负相关关系更显著;法律制度距离与CSR正相关,且负向法律制度距离与CSR正相关关系更显著;国有性质强化了经济制度距离与CSR负相关关系。该研究结论可为海外投资企业实施CSR差异化战略、政府实施CSR分类化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制度距离;企业社会责任;产权性质;海外投资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4-0111-08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全球的商业信心和经济活动虽然受到了贸易壁垒和海外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和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却逆势增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发展,东道国要求我国海外投资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央企业海外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7)》和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中国民营企业现状调查研究报告(2019)》显示,我国海外企业参与社会责任实践较少,参与程度偏低,且对社会责任重要性认识不足。我国海外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整体处于起步阶段,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忽视使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受阻或投资被迫中止的事件时有发生^①,更

有旨在抵制中国外资流入的“中国威胁论”“中国马歇尔计划”“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论”等言论爆出^②。海外投资企业在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还承受了海外投资形象受损的后果。

对海外投资企业而言,母国与东道国在经济水平、政治和法律制度、文化规范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③,使海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经营面临“外来者劣势”^④。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海外投资企业CSR实践,因此制度距离是影响海外投资企业CSR的意愿和能力的重要因素^⑤,但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以制度距离作为CSR影响因素的大样本研究却极其缺乏。有鉴于此,本文以2013年至2018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经济制度距离和法律制度距离视角,

收稿日期:2021-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046);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0A199)

作者简介:罗喜英(1976—),女,湖南洞口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①于鹏,李丽:《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社会责任风险管理及利益相关方参与》,《国际经济合作》2016年第7期。

②Tracy E F, Shvarts E, Simonov E, et al. “China’s New Eurasian Ambitions: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7(1): 56-88.

③Hah K, Freeman 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Subsidiaries and Their CSR: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Management of CSR in Smaller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4(1): 125-136.

④Zaheer S. “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2): 341-363.

⑤宋林,彬彬,乔小乐:《制度距离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研究——基于国际经验的调节作用》,《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探讨正式制度距离对 CSR 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文章的边际贡献主要有:首先,已有文献仅对正式制度距离按内涵分为经济制度距离和法律制度距离,本文进一步按制度距离的方向分为正向制度距离和负向制度距离,聚焦不同层次的正式制度距离对 CSR 的影响,丰富了制度理论方面的文献。其次,进一步探究了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考察了制度层面和组织层面因素对 CSR 的共同作用,丰富了 CSR 影响因素的研究。最后,区别于“一带一路”倡议下 CSR 的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①,本文就正式制度距离对 CSR 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可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外投资企业实施 CSR 差异化战略、政府对 CSR 行为实施分类化管理提供参考。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正式制度距离与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

制度距离是指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在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方面的差异或者相似度,分为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②。正式制度距离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等具有强制性制度因素的差异^③,非正式制度距离是由于历史传统、习俗和文化而造成的差异^④。与正式制度具有的严格约束相比,非正式制度对海外投资企业 CSR 管理的影响相对有限。

基于制度理论分析,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差异会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 CSR 战略选择,他们会采用反抗、伪装、谈判或遵守 CSR 的差异化战略^⑤。制度距离会引发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

的合法性冲突,使海外投资企业可能同时面临东道国当地的外部合法性诉求和母国母公司的内部合法性诉求。正式制度距离越大,海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经营的外部合法性需求与内部合法性要求之间的差异就越大。制度距离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产生额外的海外经营成本,进一步说明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存在“外来者劣势”^⑥。因此,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履行 CSR 的意愿和能力会产生影响^⑦。在 CSR 履行意愿上,跨国公司会更加关注如何减缓或者消除由于制度距离的存在导致在东道国经营所面临的额外的成本劣势,从而减少对东道国子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在 CSR 履行能力上,制度距离使跨国公司的经营面临“外来者劣势”,产生的额外成本将对企业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的“冗余资源”产生消极影响,从而降低东道国子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⑧。

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同理心是利他行为的激励因素^⑨,利他行为是建立在共性而非怜悯的基础上,当接收者和施惠者有相似感知时会刺激利他行为。制度距离越大,海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的交流会越困难,两者也越容易发生冲突^⑩。制度距离会减弱跨国公司管理者对东道国相似性的感知度,“移情效应”也就相应会减弱,从而 CSR 履行这种利他行为的意愿就会下降。

跨国企业的母国与东道国在经济和法律制度方面存在差异,当制度差异越明显,合法性劣势就越大^⑪。海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建立并维持合法性的难度越大,获取东道国的相关信息越少,对

①祝继高,王道,汤谷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研究——基于战略性社会责任和反应性社会责任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9期。

②潘镇:《制度距离与外商直接投资——一项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财贸经济》2006年第6期。

③Estrin S, Baghdasaryan D, Meyer K E.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and Human Resource Distance on International Entry Strateg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9(7): 1171-1196

④Herold D M, Farr - Wharton B, Lee K H, et a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and Stakeholder Pressures: Advancing a Framework for Categorising Carbon Disclosure Strategies”, *Business Strategy & Development*, 2019(2): 77-90.

⑤Tan J, Wang L. “MNC Strategic Responses to Ethical Pressure: An Institutional Log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1(3): 373-390.

⑥Zaheer S. “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2): 341-363.

⑦Campbell J T, Eden L, Miller S R. “Multinational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Host Countries: Does Distance Mat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2(1): 84-106.

⑧宋林,彬彬,乔小乐:《制度距离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研究——基于国际经验的调节作用》,《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⑨Batson C D, Shaw L L. “Evidence for Altruism: Toward a Pluralism of Prosocial Motives”, *Psychological Inquiry*, 1991, 2(2): 107-122.

⑩Lutz E, Bender M, Achleitner A K, et al. “Importance of Spatial Proximity between Venture Capital Investors and Investees in Germany”,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3(11): 2346-2354.

⑪陈怀超,范建红:《制度距离、中国跨国公司进入战略与国际化绩效:基于组织合法性视角》,《南开经济研究》2014年第2期。

CSR 的感知和理解的共性基础就越缺乏^①。经济制度距离使海外投资企业获取东道国相关信息的难度增大,企业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去熟悉东道国市场、建立人脉关系网络,这些时间和金钱侵占了企业的“资源”,削弱了海外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②。法律制度距离使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制度风险,可能会带来高昂的交易成本以及合法性缺失问题,进一步导致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其履行社会责任缺乏感知,使海外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感降低。

结合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正式制度距离与 CSR 负相关。

H1a: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制度距离与 CSR 负相关。

H1b: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法律制度距离与 CSR 负相关。

基于“制度逃逸”理论,制度距离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非对称性”^③,即企业投资于比母国制度好的东道国时,会选择制度距离更大的国家,当投资于比母国制度差的东道国时,倾向于选择制度距离较小的东道国。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于比母国制度好的东道国时,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差异使跨国公司能够获得异质性资源并获得更多的潜在收益,以制度红利抵消部分制度成本。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外投资企业而言,大多数投资的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不仅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的东道国(即正向制度距离),也包括正式制度较完善的新兴国家(即负向制度距离)。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外投资企业而言,正式制度距离对社会责任影响很可能存在“非对称效应”,即当母国正式制度相较于东道国正式制度更完善时,制度距离对 CSR 的负向影响增强。

结合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相较于负向制度距离,正向正式制度距

离与 CSR 负相关关系更明显。

H2a:相较于负向制度距离,正向经济制度距离与 CSR 负相关关系更明显。

H2b:相较于负向制度距离,正向法律制度距离与 CSR 负相关关系更明显。

(二) 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 CSR 的履行态度和履行情况是有明显差异的,因为国有企业不仅是一种企业的组织形式,还是国家所有制的表现形式。不同产权性质背景的企业在公司治理、运营目标、战略安排等方面存在差异。就企业目标而言,非国有企业是实现资本增值,达到利润最大化;而国有企业则要兼顾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要考虑社会稳定发展、官员个人政绩和获取财政收入等^④。国有企业具有政策性功能,其内涵与 CSR 强调的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相一致^⑤。国有企业在运营中会更关注 CSR 的实施,因此,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会较好。

首先,母国与东道国制度存在的差异,使海外投资企业经营面临“外来者劣势”。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大,跨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东道国政治、军事和经济风险的系数也会增大,但政府参与有助于国有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⑥。其次,制度距离的增加使 CSR 的经济效应的不确定性增加,由于民营企业在利益追求方面更加突出,势必会分散民营企业对于 CSR 的关注,从而使 CSR 履行受阻。最后,国有企业承担着更多的社会目标,国有企业更有动机学习东道国的社会行为准则,同时,为了控制关键资源并与政府建立和维持政治关联,国有企业会更好地履行 CSR^⑦。

结合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国有性质负向调节正式制度距离与 CSR 的负相关关系,即国有性质会削弱正式制度距离与 CSR 负相关关系。

H3a:国有性质会削弱经济制度距离与 CSR

①王建玲,井洁琳:《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制度距离调节的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7期。

②杨玲丽,万陆:《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社会嵌入性治理机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③Aleksynska M, Havrylychuk O. “FDI from the South: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3(29): 38-53.

④章细贞,尹哲彧,周志方,等:《管理者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财会月刊》2020年第16期。

⑤冯璐,邹燕,张冷然:《双循环格局下的竞争中性与国企改革——来自国有资本差异化功能的证据》,《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2期。

⑥武天兰,范黎波:《正式制度距离、结构整合与跨境并购绩效》,《统计与决策》2020年第12期。

⑦顾群,王文文,郑杨:《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创新吗?——基于研发异质性与产权性质视角》,《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负相关关系。

H3b: 国有性质会削弱法律制度距离与 CSR 负相关关系。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3 年至 2018 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CSR 数据来自和讯网,经济制度距离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数据库(Worldwide Government Indicators, WGI),法律制度距离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财务指标和治理数据以及海外投资目的国相关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为了进一步保证后续实证检验的可靠性,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筛选处理:(1)剔除 ST 和 *ST 企业;(2)剔除相同企业在相同年份对相同国家进行海外投资的重复数据;(3)剔除财务和公司治理数据缺失的样本。经过筛选,本文最终得到了 562 家海外投资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 23 个国家进行投资的 2 387 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 变量选择

1. 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依据和讯网公布的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作为企业社会责任(CSR)的代理变量。

2. 制度距离

首先,本文将正式制度距离按内涵分为经济

制度距离(ED)、法律制度距离(LD);其次,考虑母国(中国)与东道国制度距离方向,进一步划分为正向制度距离和负向制度距离,当母国的制度得分优于东道国时为正向制度距离,当母国的制度得分劣于东道国时为负向制度距离。对于制度距离的测算,本文参考已有文献^①后提出制度距离测算公式(1),即

$$\sum_{d=1}^n (I_{dh} - I_{dc})^2 / nV_d \quad (1)$$

其中, I_{dh} 是海外投资企业母国 h (中国) 在 d 维度的制度得分, I_{dc} 是东道国 c 在 d 维度的制度得分, n 是该制度距离所包含的维度数量, V_d 是 d 维度上的各国的得分方差。经济制度距离依据全球经济的自由度指数 10 个维度计算,法律制度距离是依据全球治理指数的 6 个维度计算。

3. 调节变量

企业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设置最终控制人性质的虚拟变量,国有企业为 1,非国有企业为 0。

4. 控制变量

根据国内外与 CSR 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文献,在考察正式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时,本文加入了下述控制变量: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规模(SIZE)、独立董事比例(DR)、双职合一(DUAL)、高管持股(IO)、机构持股(MO)和企业年龄(AGE),主要变量的具体定义与计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定义及计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	CSR	依据和讯网公布的上市公司 CSR 评分
解释变量	经济制度距离	ED	基于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 2013 年至 2018 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测算
	法律制度距离	LD	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 2013 年至 2018 年全球治理数据测算
调节变量	企业性质	STATE	国有企业为 STATE=1,非国有企业为 STATE=0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总资产
	企业规模	SIZE	Ln(期末资产总额)
	独立董事比例	DR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控制变量	双职合一	DUAL	总经理兼任董事长为 1,否则为 0
	高管持股	IO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公司总股本
	机构持股	MO	机构持股合计/流通 A 股
	企业年龄	AGE	当年年份减去上市年份

(三) 模型设定

为了探究“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外投资企

业母国(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 CSR 的影响,验证假设 H1a 和假设 H1b,本文构建检

^①Kogut B, 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3): 411-432.

验模型(2):

$$CSR_{i,t} = a_0 + a_1ED_{i,t} + a_2LD_{i,t} + \sum_{j=1}^7 \beta_j control_{j,t}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为了探究不同方向的制度距离对 CSR 影响的差异,本文将样本按母国(中国)与东道国的经济制度距离和法律制度距离的不同方向进行分组回归检验,以此验证假设 H2a 和 H2b。

为了探究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本文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制度距离(ED)与产权性质(STATE)的交乘项(ED×STATE)、法律制度距离(LD)与产权性质(STATE)的交乘项(LD×STATE),验证假设 H3a 和 H3b,构建模型(3):

$$CSR_{i,t} = a_0 + a_1ED_{i,t} + a_2LD_{i,t} + \alpha_3ED_{i,t} \times STATE + \alpha_4LD_{i,t} \times STATE + \sum_{j=1}^7 \gamma_j control_{j,t}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3)$$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正式制度距离、产权性质和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四) 描述性统计

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外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CSR)的均值是 25.81,标准差是 16.43,中位数是 23.24,说明海外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整体水平偏低且不均衡。以母国(中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来说,经济制度距离(ED)均值是 1.23,标准差是 0.90,中位数是 0.80;法律制度距离(LD)均值是 1.13,标准差是 1.20,中位数 0.65,说明母国除了与少数东道国的制度距离偏大,与大部分东道国的制度距离较小。产权性质(STATE)均值是 0.56,标准差是 0.50,说明“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外投资的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数量多。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P ₂₅	中位数	P ₇₅	最大值
CSR	2 387	25.81	16.43	-17.40	18.19	23.24	28.25	84.41
ED	2 387	1.23	0.90	0	0.43	0.80	2.33	3.47
LD	2 387	1.13	1.20	0	0.14	0.65	2.03	3.75
STATE	2 387	0.56	0.50	0	0	1	1	1
ROA	2 387	0.04	0.08	-1.07	0.02	0.04	0.07	0.48
SIZE	2 387	23.20	1.60	19.61	22.07	23.09	24.02	30.95
DR	2 387	0.38	0.06	0	0.33	0.36	0.43	0.67
DUAL	2 387	0.31	0.46	0	0	0	1	1
IO	2 387	0.09	0.20	0	0	0	0.09	5.91
MO	2 387	8.12	7.18	0	2.69	6.62	11.79	61.12
AGE	2 387	10.44	6.85	0	5	9	16	28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正式制度距离与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

从表 3 第(1)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制度距离(ED)的回归系数为-5.507,且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经济制度距离对 CSR 有显著负向影响,即经济制度距离越大,企业 CSR 水平越低,假设 H1a 得到了验证。然而,法律制度距离(LD)的回归系数为 4.144,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法律制度距离对 CSR 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法律制度距离越大,企业 CSR 水平越高,假设 H1b 未得到验证。这可能是由于法律责任是位于 CSR 金字塔模型的底部,合规守法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开展经营应遵守的底线。当东道国制度优于母国

并且两者的法律制度距离越大,海外投资企业为了合规经营,减少不必要的违法成本,往往会采取东道国的标准来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海外投资企业履行 CSR 表现就越好。

(二) 正向/负向正式制度距离与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

考虑不同方向的制度距离对海外投资企业 CSR 的影响,本文将样本企业划分为正向制度距离组和负向制度距离组进行分组检验。首先,将样本按照经济制度距离的方向划分为正向经济制度距离组和负向经济制度距离组,从表 3 第(2)和(3)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经济制度距离为正向时,经济制度距离(ED)的回归系数为-23.484,且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当经济制

度距离为负向时,经济制度距离(*ED*)的回归系数为-3.318,但不显著;结果表明正向经济制度距离对 *CSR* 的负向影响更显著,假设 H2a 得到了验证。其次,将样本企业划分为正向法律制度距离组和负向法律制度距离组,从表 3 第(4)和(5)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法律制度距离为正向时,法律制度距离(*LD*)的回归系数为 8.429,但不显著;当法律制度距离为负向时,法律制度距离(*LD*)的回归系数为 4.039,且在 1%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负向法律制度距离对 *CSR* 有更显著正

向影响,研究假设 H2b 未得到验证。这是由于法律制度距离对 *CSR* 有显著正向影响,当法律制度距离为负向时,即东道国制度优于母国时,海外投资企业需要采取东道国的法律准则履行社会责任,当距离差异越大时,东道国对社会责任的要求越高。*CSR* 是超越法律所要求的推进社会公益的行为,海外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履行 *CSR* 来满足社会制度和道德期望以追求外部合法性,海外投资企业为获得合法性和降低违法成本,则 *CSR* 表现会越好。

表 3 正式制度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分析结果

	(1) 总样本 <i>CSR</i>	(2) 正向经济制度距离组 <i>CSR</i>	(3) 负向经济制度距离组 <i>CSR</i>	(4) 正向法律制度距离组 <i>CSR</i>	(5) 负向法律制度距离组 <i>CSR</i>
<i>ED</i>	-5.507**(-2.450)	-23.484***(-4.468)	-3.318(-1.225)	-13.551***(-2.632)	-5.456**(-1.964)
<i>LD</i>	4.144*** (4.123)	13.181*** (4.291)	3.390*** (2.868)	8.429(0.818)	4.039*** (3.321)
<i>ROA</i>	33.500*** (6.563)	78.310*** (5.534)	31.701*** (5.230)	70.872** (2.554)	31.572*** (5.345)
<i>SIZE</i>	5.773*** (3.752)	11.151*** (3.567)	5.659*** (3.112)	20.397*** (2.726)	4.743** (2.530)
<i>DR</i>	11.527(0.964)	4.431(0.205)	13.258(0.954)	1.987(0.069)	11.387(0.782)
<i>DUAL</i>	-0.839(-0.571)	1.157(0.421)	-1.168(-0.674)	3.139(0.745)	-0.237(-0.130)
<i>IO</i>	0.284(0.050)	-0.391(-0.045)	0.867(0.125)	-9.992(-0.567)	-1.848(-0.251)
<i>MO</i>	0.268*** (3.779)	0.180(1.574)	0.307*** (3.540)	0.129(0.545)	0.324*** (3.761)
<i>AGE</i>	-3.198*** (-8.428)	-2.900*** (-4.835)	-3.506*** (-6.891)	-4.211*** (-3.793)	-2.971*** (-6.021)
<i>_cons</i>	-80.305** (-2.346)	-204.873*** (-2.946)	-76.092* (-1.885)	-405.707** (-2.436)	-58.353(-1.405)
N	2 387	554	1 833	561	1 826
AD-R ²	0.184	0.289	0.176	0.215	0.175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三) 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表 4 第(1)列的回归结果体现出产权性质对经济制度距离与 *CSR* 关系的调节效应,*ED* 与 *STATE* 的交乘项(*ED*×*STATE*)的回归系数为 6.593,且在 10%水平上显著,即国有性质正向调节经济制度距离与 *CSR* 的负相关关系,表明相比于非国有企业,经济制度距离对国有企业 *CSR* 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研究假设 H3a 未得到验证。表 4 第(2)列的回归结果体现出产权性质对法律制度距离与 *CSR* 关系的调节效应,*LD* 与 *STATE* 的交乘项(*LD*×*STATE*)的回归系数为-2.084,但不显著,表明法律制度距离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 *CSR* 的影响无明显差异,研究假设 H3b 未得到验证。表 4 第(3)列的回归结果体现出产权性质对正式制度距离(经济和法律)和 *CSR* 关系的调节效应,*ED* 与 *STATE* 的交乘项(*ED*×

STATE)的回归系数为 6.877,且在 10%水平上显著;*LD* 与 *STATE* 的交乘项(*LD*×*STATE*)的回归系数为-2.270,但不显著,结果与表 4 第(1)和(2)列结果保持一致。这是由于受到二元经济体制割裂的影响,国有企业具有产权联系的先天优势,非国有企业履行 *CSR* 时会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寻租倾向,市场竞争越激烈,寻租倾向就越强。“一带一路”倡议下走出去的非国有企业在品牌知名度和认可度上通常都不如国有企业,制度距离会使非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外来者劣势”和合法性压力,因此,企业会选择履行 *CSR* 以满足社会制度和道德期望来追求外部合法性。当东道国和中国存在正式制度距离差异时,为了获得东道国政府的认可,非国有企业更加有动机通过履行 *CSR* 来弥补正式制度距离带来的“外来者劣势”。

表 4 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1)	(2)	(3)
	CSR	CSR	CSR
<i>ED</i>	-9.293***(-3.045)	-5.470**(-2.434)	-9.415***(-3.085)
<i>LD</i>	4.051*** (4.029)	5.312*** (3.864)	5.320*** (3.873)
<i>ED</i> × <i>STATE</i>	6.593*(1.832)		6.877*(1.908)
<i>LD</i> × <i>STATE</i>		-2.084(-1.245)	-2.270(-1.355)
<i>ROA</i>	34.318*** (6.703)	33.738*** (6.606)	34.613*** (6.756)
<i>SIZE</i>	5.607*** (3.641)	5.491*** (3.532)	5.293*** (3.400)
<i>DR</i>	11.542(0.966)	12.170(1.017)	12.243(1.024)
<i>DUAL</i>	-0.814(-0.555)	-0.821(-0.559)	-0.794(-0.541)
<i>IO</i>	1.136(0.200)	0.809(0.143)	1.745(0.306)
<i>MO</i>	0.272*** (3.834)	0.269*** (3.789)	0.273*** (3.847)
<i>AGE</i>	-3.171*** (-8.356)	-3.134*** (-8.186)	-3.100*** (-8.095)
<i>_cons</i>	-76.739** (-2.240)	-74.821** (-2.168)	-70.611** (-2.044)
N	2 387	2 387	2 387
AD-R ²	0.186	0.185	0.187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一,加入非正式制度距离。在稳健性检验中加入文化制度距离(*CD*)代表非正式制度距离,回归结果如表 5 第(1)列所示,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第二,连续变量缩尾处理。为了消除极端值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缩尾处理后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5 第(2)列所示,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第三,缩小样本量。对样本企业按经营年

限进行划分,选取在样本观测期间最低经营年限不少于 8 年的企业为样本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5 第(3)列所示,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第四,自变量滞后。考虑正式制度距离与 CSR 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会干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选取自变量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采用 2SLS 模型解决内生性偏差,其中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如表 5 第(4)和(5)列所示,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以上检验表明,研究结论保持稳健。

表 5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CSR	CSR	CSR	CSR	CSR
<i>ED</i>	-5.888***(-2.935)	-4.899**(-2.252)	-5.707**(-2.489)	-7.976***(-3.160)	
<i>LD</i>	4.195*** (4.254)	4.585*** (4.701)	4.196*** (4.084)		3.488*** (3.158)
<i>CD</i>	2.338(1.424)				
<i>ROA</i>	32.980*** (5.390)	87.447*** (10.142)	33.619*** (6.460)	27.392*** (4.722)	29.119*** (5.001)
<i>SIZE</i>	5.682*** (3.719)	6.217*** (4.176)	6.865*** (4.302)	4.431** (2.120)	4.865** (2.326)
<i>DR</i>	2.629(0.203)	11.107(0.932)	3.978(0.314)	-8.792(-0.581)	-8.658(-0.572)
<i>DUAL</i>	-0.588(-0.378)	-0.166(-0.116)	-0.732(-0.491)	-0.635(-0.353)	-1.047(-0.581)
<i>IO</i>	-3.120(-0.496)	2.878(0.499)	-0.758(-0.132)	3.833(0.516)	3.882(0.523)
<i>MO</i>	0.156** (2.001)	0.262*** (3.688)	0.251*** (3.399)	0.222** (2.365)	0.227** (2.419)
<i>AGE</i>	-2.934*** (-7.494)	-3.046*** (-8.357)	-3.401*** (-8.689)	-2.446*** (-5.165)	-2.716*** (-6.140)
<i>_cons</i>	-80.033** (-2.383)	-95.830*** (-2.884)	-99.705*** (-2.805)		
N	1 742	2 387	2 324	1 272	1 272
AD-R ²	0.175	0.216	0.186	0.129	0.129

五 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首先,从制度距离内涵上看,经济制度距离与 CSR 显著负相关,但是法律制度距离与 CSR 显著正相关。这是由于法律责任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开展经营应履行的底线,当法律制度距离越大,企业可能采取更符合东道国要求的高

标准来履行底线社会责任,海外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表现就越好。

其次,从制度距离方向上看,正向和负向制度距离对 CSR 影响有差异。对于经济制度距离,正向经济制度距离和负向经济制度距离与 CSR 显著负相关,但正向经济制度距离与 CSR 负相关关系更明显;对于法律制度距离,负向法

律制度距离与 CSR 显著正相关,而正向法律制度距离与 CSR 正相关关系不显著,表明正式制度距离对社会责任影响存在“非对称效应”。

最后,本文在考虑产权性质对正式制度距离与 CSR 关系的调节作用时,发现企业的国有性质正向调节经济制度距离与 CSR 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经济制度距离与国有企业 CSR 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

(二)理论启示与政策建议

首先,海外投资企业履行 CSR 战略要适应东道国制度环境。由于母国与东道国经济、法律制度不尽相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应采取差异化战略处理母国与东道国因制度距离产生的“外来者劣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我国对外投资的整体形象和企业竞争力,保证海外投资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降低“外来者劣势”成本,海外投资企业履行 CSR 应采用“差异化”战略,当母国制度质量明显高于东道国时,企业应采取全球化战略来提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 CSR 履行水平;当母国制度质量低于东道国时,企业应该采取本地化的战略来满足东道国的底线责任标准。

其次,海外投资企业履行 CSR 战略要考虑

自身产权性质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因经济制度距离的增加,其 CSR 履行阻碍更加明显。政府应当鼓励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时积极参与 CSR 履行,积极融入东道国的经济社会中,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应不断适应当地的经济制度环境,了解当地的法制规范,以提升其在东道国履行 CSR 意愿的能力。

最后,政府应对海外投资企业 CSR 行为进行分类化管理。政府在海外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管理上不可一概而论,应该进行分类化管理,包括母国与东道国制度性差异的分类化管理和投资母公司的产权性质的分类化管理两种。CSR 作为一种基于伦理的沟通渠道,它可有效抑制来源于海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社会关系不稳定的政治风险,并对东道国政府的社会政治风险具有正向管制作用。政府有责任加大对海外投资企业 CSR 行为的指导和规范力度,应当鼓励海外投资企业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借鉴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的成功经验,努力提高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能力,降低海外投资风险。

Formal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Overseas Investment Enterprise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UO Xi-ying & ZHANG Rui-min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Using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that have invested oversea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from 2013 to 2018 as a s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 between formal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of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consider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tate ownership on the rel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institutional distance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CSR, and the posi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al distance is more significant. Legal institutional distanc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CSR, and the distance of negative legal system is more significant. Further test indicates that the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CSR i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is stronger than that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non-SOEs). The findings have provided ideas for overseas investment enterprises under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to implement CSR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and for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CSR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rmal institutional distanc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ate ownership;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责任校对 朱春花)